

柬埔寨的驱逐 和抵抗

五名妇女讲述她们
的经历

AMNESTY
INTERNATIONAL



本出版物的访谈于2011年2月至9月进行。国际特赦组织的档案保存了所有的原始材料。

本文件属于国际特赦组织“要求尊严”运动的材料，该运动的焦点之一是非正式定居点或贫民窟居民遭受的人权侵犯。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终止强行驱逐，确保人人有平等渠道获取公共服务，并促使非正式定居点居民积极参与那些影响其生活的决定和进程。

欲了解和本文件相关的建议，请参阅《柬埔寨的驱逐和抵抗 — 建议》（索引号：ASA 23/007/2011）；欲了解更多国际特赦组织在柬埔寨的工作，请参阅：《铲平权利：柬埔寨的强行驱逐现象》（索引号：ASA 23/002/2008）。

国际特赦组织还为本文件中重点描述的妇女制作了一系列影片。请浏览 www.amnesty.org 观看记录片《柬埔寨的驱逐和抵抗经历》以及五部分别针对每名妇女的影片。

封面照片：希普（Heap）抱着她的儿子温萨旺（Voeun Savong）。

© 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场全球运动，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300 多万支持者、成员和活动人士参与，致力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准则上刊载的所有权利。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会费和公众捐款。

**AMNESTY
INTERNATIONAL**



目录

前言	5
她们的话	
麦	7
苏法尔	11
洪	15
希普	19
万妮	23
后记	27
最后的话	28

《柬埔寨的驱逐和抵抗》讲述了 5 名妇女的经历。一场影响到柬埔寨全国数千万人的悲剧，令她们的生活恶化。麦（Mai）、苏法尔（Sopha）和希普（Heap）因强行驱逐而受精神创伤；而洪（Hong）和万妮（Vanny）则在抵抗强大的商业利益团体的侵害行动，这些利益团体威胁她们的家园和生计，完全无视她们的权利。无论这些妇女是已遭驱逐，还是仍在坚守家园，她们都表现出勇气、机智和镇定的执着。

前言

过去 20 年，柬埔寨走出了武装冲突、经济崩溃和孤立的阴影。这些变化为柬埔寨的妇女既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妇女仍是家庭的支柱和家务的主持者，同时也步入了该国最为激励人心的企业家、专业人士、政界人士、活动人士、艺术家和社区领袖的行列。

许多柬埔寨妇女想利用这些新机会，并避免遭受贫穷、虐待和剥削的危险，但她们由于面临从家园和土地上被强行驱逐的威胁而受到阻碍。强行驱逐是指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将她们从其所有的家园和土地上驱逐，而且并无法律保护和国际人权法律所要求的其他保障措施。强行驱逐侵犯了适当住房权，为各种人权条约所禁止，而柬埔寨是这些条约的缔约国。

许多联合国人权监督机构以及国家和国际级别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都揭露了柬埔寨当局在保护人们免遭强行驱逐方面，在体制上有疏忽职守的情况。目前在柬埔寨全国各地，以经济发展名义进行的强行驱逐经常发生，地方精英势力和外国投资者试图从新近私有化的土地市场中获利，并控制柬埔寨的自然资源。政府当局则经常积极协助强行驱逐，或不采取行动，法律被选择性地使用或完全忽视。

本出版物讲述了麦（Mai）、苏法尔（Sophal）、希普（Heap）和万妮（Vanny）这 4 名柬埔寨妇女的经历，她们面临从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上被强行驱逐，或抵抗强行驱逐。本出版物还讲述了洪（Hong）的经历，她是一名原住民社区的妇女，面临失去森林的危险，而这些原住民传统上是依赖森林生存。

当麦目睹她的家园和全部财产付之一炬时，她已怀有 5 个月的身孕。几天之后，她因试图捍卫自己的住房权而被捕入狱 8 个月。

苏法尔住在一个气氛活跃的内城社区，他们抵抗了驱逐行动 3 年多。直到一天晚上，该社区遭到数百名警察和公司工作人员的包围和突袭，仅在几小时之内就摧毁村庄。

洪是库伊人（Kuy），这是柬埔寨的原住民群体之一，世代居住在白朗（Prey Lang）森林地区。森林为洪和她的社区提供了家园和生计。而现在，随着森林遭到毁灭，洪带领她的社区抗争，保护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希普的丈夫因虚假的指控而被捕入狱，当局和一名商人在当天夺走了她村庄的所有耕地。由于没有土地，丈夫也不在身边，她忽然之间必须独自养活自己和 4 个年幼的孩子。

万妮在领导一场引人注目的斗争，以对抗自红色高棉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强行驱逐行动。她位于金边市中心万古湖（Boeung Kak）湖畔的住所受到威胁。万妮在尽一切努力保卫自己的家园，她的抗争取得了成效。8 月，首相签署命令要求将万古湖开发项目所在地的一部分地区，用于给未搬走的居民原地建房。虽然现在不清楚将如何具体落实该计划，而且一些居民没有包括在内，但这仍是社区的重大胜利。

这 5 名妇女的经历包含她们的勇敢斗争、艰辛与悲痛，这样的经历并非她们独有。强行驱逐或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和社区，会造成精神创伤；家园、耕地或作为其他固定收入来源的土地被毁，会对人们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但妇女经常遭受特殊的影响。

强行驱逐经常导致社区网络和非正规支持系统的解体，而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依赖于这些系统。这经常意味着儿童的教育被中断，医疗保健服务减小，家庭成员的精神和身体健康情况恶化。因为许多强行驱逐的受害者被重新安置到远离市中心和缺少工作机会的地区，因此文

6 柬埔寨的驱逐和抵抗
五名妇女讲述她们的经历

夫长时间不在家中，他们的妻子不得不独自操劳家务并解决家庭需要。

尽管如此，这些妇女作为家庭的主要照料者，为自己找到了应对的方法。这里提及的妇女面对过强行驱逐，或继续抵抗被驱逐和赶出自己的土地，她们的表现交织着恐惧、勇敢、愤怒和冷静的执着。

她们的话

麦

“我的房子、财产、身份证、照片都被烧掉了，什么也没留下。”

2008年，柬埔寨政府在奥多棉吉省（Oddar Meanchey）出让了3块经济特许土地给3家相互关联的公司，用于工业化糖料种植。当局没有和该地区的居民协商，并开始威胁和恐吓他们，以迫使他们离开家园和耕地。2008年4月，据称是公司职员的公司工人拆毁了150所住房。居民随后继续受到压力。2009年10月，100多家住房被推土机铲平。许多家庭因强行驱逐行动而处境艰难，有的无家可归，另有一些社区成员被捕入狱。

麦在2009年10月被捕入狱，当时她已怀孕5个月。她从西北部奥多棉吉省偏远的家乡，长途跋涉了250多公里来到首都金边，请求首相洪森帮助她的社区取回他们的土地。她因此被控违反了《森林法》，并遭监禁。

在此几天之前，麦无助地看着她的家园，以及她所在的伯斯村的118所其他住房，被大约150名警察、宪兵、林业管理人员和据认为是公司职员的村民铲平和烧毁。

2008年，吴哥糖业公司（Angkor Sugar Company）得到了麦所在村庄周围6,500多公顷的特许土地。该公司和当局都未能向该地区的居民家庭，提供有关土地特许权或他们的住房和耕地权利情况的适当信息。关于公司计划或他们会如何受到影响，居民家庭没有得到协商。当地居民的抗议被置之不理，据报获赋予土地特许权后不久，公司人员就开始清除村民的稻田来种植甘蔗，包括麦的稻田。麦解释说，公司人员把稻子留给了他们自己，而麦和她的社区则因此丧失了来年赖以生存的主食。

村庄住房首次被毁是在2008年4月，随后，其余家庭受到威胁和恐吓，目的是要他们离开。居民称当局给他们压力，要求他们接受分配给他们的替代土地。当局告知他们，如果不接受这些土地，他们就不会得到任何东西，而且会受到刑事调查。村民称，当局给他们的土地比被夺走的土地小得多，而且有些土地是第三方所有。尽管遭受压力，大多数村民拒绝当局的提议。

“我们跑步穿过森林，游泳渡过河流，去向首相[洪森]申诉。”

2009年10月9日，警察、宪兵、林业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焚烧并摧毁了麦所在村庄的残余部分。麦回忆说：“我的房子、财产、身份证、照片都被烧掉了，什么也没留下。”警察把枪对准任何敢于保卫自己房屋和财产的人。村民因惧怕遭杀害而逃离，四处寻找安身之处。

3天后，麦、她的丈夫和其他6名男子开始步行跋涉去寻求帮助。麦解释说：“我们跑步穿过森林，游泳渡过河流，去向金边的首相[洪森]申诉。我们以为是村镇和省级的当局在背后策划，但如果首相知道了，他就会帮我们。”麦等一行人最终到达了金边，但无法获准与首相或其他政府官员接触。在失望和精疲力尽的状态下，他们在市中心的一座古塔中安身。

麦说：“我太吃惊了，我当时没有穿鞋…只穿着短袖衬衫和

裙子，我在流血，但他们不让我拿我的鞋和衣服。他们把我拖到车里。”

当天晚上，麦听到警察到来的声音。在村庄被毁前夕，警察曾逮捕了一些社区领袖，以此为策略来逼走村民，并压制那些抵抗者的声音。由于害怕因争取让首相关注局势而被捕，麦的丈夫和其他 3 人设法逃脱，但麦因为怀孕而无法再奔跑，她和其他 3 名男子被警察抓住。

麦说：“我太吃惊了，我当时没有穿鞋…只穿着短袖衬衫和裙子，我在流血，但他们不让我拿我的鞋和衣服。他们把我拖到车里。” 3 名男子随后很快获释，但麦由于被指控为头目，遭到逮捕并被带到暹粒监狱。自从那夜之后，她再也没见到她的丈夫，也没有听到他的音讯。

狱中度过孕期

由于正式被控犯有违反《2002 年森林法》的罪行，麦随后被监禁了 8 个月。虽然她担心狱中的恶劣环境和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而流产，但她还是度过了孕期。她说：“情况很困难。我生病而且流血，我疼痛极了。没有人照顾我。我的孩子们没有钱，所以不能来看望我。”

麦说，当她分娩时，她的情况如此糟糕，狱长“不敢让[她]留在监狱里”。她被带到公立医院。她当天稍后时间仍没有生下孩子，监狱看守把她带回监狱。她在狱中分娩了 3 天 3 夜。看守在麦快生孩子前把她带回医院。她说：“我觉得糟糕和难受极了。没有丈夫和家人在场，我觉得像一个寡妇。”她在生下一个男婴仅几小时后，就被带回了监狱。

“我生病而且流血，我疼痛极了。没有人照顾我。我的孩子们没有钱，所以不能来看望我。”

麦给她的儿子取名为桑南（Samnang），意思为“幸运”，因为她认为他的幸存是一个奇迹。她的囚室还另外关押着 7 名妇女，她在那里喂养桑南近两个月。尽管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她仍尽力照顾自己和婴儿。犯人得到的米饭很脏，几乎无法食用。麦无法提供足够的母乳来哺育桑南，也难以保持囚室和寥寥无几的衣服清洁。麦说她和婴儿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在 2010 年 6 月，麦在被关押了 8 个月后可以与法官见面，但法庭没有以非法砍伐森林的罪名审判她，该罪名是她被捕的理由。法庭告诉麦，如果她签字同意放弃其在伯斯村的所有土地，并接受替代的土地，她就会获释。麦签署了协议，并返回奥多棉吉，但她从未得到当局所承诺的土地。

回到奥多棉吉

麦怀着矛盾的心情回到家乡。虽然她高兴地发现，她年幼的孩子平安无事，她住在她大女儿在塔曼村（Taman）的小木屋中，但年龄更大的孩子则选择越过附近的边境到泰国去找工作。她还听说她的丈夫在泰国，但没有人能确认他的下落。

她的孩子和丈夫都没有给她寄任何钱。麦现在每天都在艰难地养家糊口，她的十多岁儿子搜寻蜥蜴和青蛙，来出售或食用。她七岁的女儿帮助料理家务，包括在夜里从村中的井里取水，其余时间井都是完全干涸的。桑南现在刚满一岁不久，麦说因为缺乏其他食物，她将尽可能地继续用母乳喂养他。麦的一个女儿去了泰国，但留下了一个比桑南小两个月的婴儿，

麦也必须照顾他。她争取家人能吃到两餐少量的米饭，这是由非政府组织或一名同情她的邻居捐送的，其余就是每天他们能找到的任何食物。

麦现在 48 岁，有 8 个年龄从 1 岁到 28 岁不等的孩子。她解释说，她本不想有这么多孩子，但她从未被教导如何控制生育。即使有这么多孩子，在遭驱逐前，“家里总是有足够的食物……没有人挨饿”。她回忆着快乐的日子：“我们能找到鱼和肉，能采到[4 种不同的]蘑菇来卖和吃。”

麦在伯斯村出生长大，她的家人在红色高棉时期能留在该地区。红色高棉于 1979 年垮台后不久，麦结识了她的丈夫，他是一名军人。

在柬埔寨内战期间（1970 至 75 年），奥多棉吉地区埋设了许多地雷。伯斯村的村民因此没有种植许多庄稼，直到在 1998 年一些土地经排雷后变得安全。随着村庄人口增长到 200 多户，地方当局在 2003 年另外分给麦的家庭和其他村民 5 公顷稻田。麦的家庭住房简单但舒适，她在家附近挖了一口能提供足够水源的井。她建了一间独立的洗手间，既有隐私，也确保卫生。由于没有电，家里夜间使用油灯。虽然她无力使自己所有的孩子上学，但上学的两个孩子的学校在步行距离内。

空旷的田地

如今麦的村庄荡然无存。武装的公司人员守卫着甘蔗地，四周则是空旷的田地。该地区以前是茂密的森林，在过去 10 年遭到严重砍伐，而柬埔寨自 2002 年起在全国禁止此类砍伐。该地区大部分地方被分割为经济特许土地，出让给私营公司。

在过去 10 年中，政府没有就居住或依赖这些土地的社区所受的影响，进行适当评估和缓解，就把土地出让给柬埔寨和国外的投资者，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2007 年，联合国秘书长柬埔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的一份报告发现，经济特许土地“负面影响到农村社区的人权和生计”。

这些特许土地经常完全或部分侵占人们的家园和耕地，而且几乎或完全没有和当地社区协商。对于大多数被迫放弃自己部分或全部土地的人，当局提供的赔偿或新定居点的土地通常不足以使他们能找到适当的替代住房或生计。人们经常在没有法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被强行驱逐出原有的土地。

那些试图挑战经济特许土地合法性和自己土地被征占的人，一般无法得到有效的司法补救。虽然没有公开的具体数据，据估计，经济特许土地覆盖柬埔寨全部可耕地超过 50% 面积。

官方称经济特许土地出让的目的，是发展工业化农产品种植。农业部的网站显示，在 2008 年 1 月 24 日，在奥多棉吉，私营公司被赋予三项为期 70 年的土地特许权，其中包括伯斯村周围的地区。根据记录，每项特许权都是基于相同目的：糖料种植园和加工厂。柬埔寨法律将经济特许土地出让的面积限制为 1 万公顷，而一公司所有者通过设立多家公司，并申请相连的土地来绕过法律，是一种常见现象。

与此同时，麦陷于贫困交加和家庭破裂的境地。她觉得政府彻底抛弃了她，她将自己的处境归罪于地方当局。“那些应该每天照顾人民的人，他们为什么让[公司]夺走人们的土地？”她现在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稻田、没有丈夫，要照料 5 个孩子，只能每天挣扎求存。她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指望。一切都完了。”

- 10 柬埔寨的驱逐和抵抗
 五名妇女讲述她们的经历

霍伊·麦 (Hoy Mai) 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与国际特赦组织谈话。

“那些应该每天照顾人民的人，他们为什么让[公司]夺走人们的土地？”

苏法尔

“他们在夜里来拆房子。我求他们不要拆毁我的房子，让我把我的东西搬到外面，但他们不同意。我只能挽回一台缝纫机。”

2009年1月的一天早上，金边市中心戴克拉霍姆（Dey Krahorm）地区约400户家庭遭强行驱逐。他们受到数百名警察和手持斧头、锤子、铁棒和电棍的拆迁工人袭击，这些工人由私人雇佣。随着推土机和挖掘机摧毁他们的家园，居民急迫地试图抢救他们的财产。与此同时，警察向他们发射橡皮子弹，并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龙。虽然在驱逐行动前，已有其他数百户家庭在胁迫下离开，但其余留下的家庭继续要求当局尊重他们的适当住房权，包括得到适当的赔偿。为争取公正和解或找到其他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谈判以失败告终，而遭强行驱逐的许多家庭目前住在金边市郊的一处新定居点。

31岁的苏法尔坐在她公寓房的地砖上，给她的小女儿蒂达（Thida）喂米饭。公寓房是一间建筑简单、面积为4米 x 10米的水泥房，这是达纳克追扬（Damnak Trayoung）定居点的典型房屋结构。苏法尔解释说，由于她的丈夫在金边市中心生活和工作，而且她的家族和社区因强行驱逐行动而各奔东西，她许多时候都是与蒂达单独待在一起。

达纳克追扬距金边市中心大约20公里。其一排排看似车库的建筑结构，与位于金边市中心巴萨河区（Tonle Bassac）的戴克拉霍姆村，以及其由乐师和艺人组成的社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戴克拉霍姆在高棉语中的意思是红土地。村庄的名字是在1980年代起的，因为红色高棉时期后的首批居民用红色土壤填平了沼泽地，作为他们住房的地基。文化和艺术部将戴克拉霍姆的土地分发给了艺人和乐师，其他人是在1990年代初期从泰国边境的难民营被遣返后定居在那里。多年来，因为其市中心位置和工作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家庭买下了村里的土地。

1990年，苏法尔的家庭在戴克拉霍姆买了一块土地，建造了一所房屋，并入住定居，当时她11岁。在随后的岁月中，村庄和金边发生了巨变。1991年，柬埔寨签署了《巴黎协议》，旨在结束数十年的国内冲突。随后不久，大批为联合国工作的外国人和众多的发展组织在金边涌现。随着柬埔寨人争先步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市中心地区迅速地城市化。

苏法尔在成长过程中对生活感到乐观，她梦想成为一名专业裁缝。当她年纪大了，她开始当美甲师和裁缝，在家里经营小生意，村附近的居民经常来光顾。她嫁给了村里一名叫苏卡（Sokha）的人，他只有一条腿。

她说：“村里有许多男子向我求婚，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们，因为我觉得男人不尊重妇女。但我丈夫，我选了他。他有残疾，但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他不懒。”婚后，苏法尔在附近的出版社找到一份工作，她每天晚饭时回到家里。苏法尔和她的家人努力工作，并享有社区归属感以及城市提供的服务和设施。

但在2000年代中期，戴克拉霍姆受到威胁。金边市政府和一些公司联手有系统地拆除了巴萨河地区周围的老房社区，为新的豪华建筑腾地。计划修建的有新的政府建筑、高级宾馆和新的澳大利亚大使馆。而在戴克拉霍姆和周边村庄定居或买地的家庭，占用一些金边最为昂贵的土地。随着土地价格迅速地增长，商人和政府官员开始盯上这些“麻烦的”村庄。戴克拉霍姆有重大的利害关系，2007年，这片3.6公顷的土地被当地的房产中介估价为约4,400

万美元。

被违背的承诺

戴克拉霍姆没有铺平的街道或整齐排列的房子，村中有大约 800 家住户，他们许多没有得到正式的产权证，但多年来，地方当局签发的文件承认了住户拥有产权。房屋有的是简陋的木棚，有的是两层砖建住宅。许多戴克拉霍姆的住户是贫困者，但他们参与村庄和四周城市的经济活动，并努力工作，因此能慢慢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根据柬埔寨的《土地法》，在 2001 年前搬到戴克拉霍姆并符合法律规定中一些其他条件的居民，有很强的理据声称具有房地产所有权，并有资格申请产权证。尽管如此，此类申请都被拒绝或置之不理。

“他们从没有来直接问过我，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们没有和居民交流过。”

苏法尔解释说：“当我们的戴克拉霍姆社区与公司面临冲突时，我们一致同意申请从……政府那里要求取得产权。申请交了上去，但……我们等啊等啊……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尽管如此，苏法尔不知道一家名为 7NG 的公司在 2006 年 12 月已获得了产权。

2005 年，7NG 已经开始向戴克拉霍姆的社区领袖提出，用建造在市郊达纳克追扬地区便宜的房子来交换土地。首相洪森两年前曾许诺说，戴克拉霍姆将成为金边首批得到官方承认和就地升级改造支持的城中贫困村之一。

当居民发现，当局不但没有实施升级改造计划的承诺，而且社区领袖还在劝说下代表他们交换了土地，他们极为愤怒。根据柬埔寨法律，这些领袖无权出售居民的土地，所以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苏法尔解释说：“他们从没有来直接问过我，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们没有和居民交流过。”居民开除了领袖，并以背信的理由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解除合同，但法院却对社区的申诉置之不理。

开始抗争

这标志着他们开始了一场长达 3 年的抗争。虽然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土地权利进行了非凡的行动，但苏法尔的家庭和社区的抗争仍以伤心的结果告终。公司和政府向居民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接受条件并搬到达纳克追扬的公寓房中，或者同意接受 8 千美元的替代赔偿。随着压力增大，800 户家庭中的数百户拆掉了自己的房子并离开。

对于苏法尔一家来说，带着仅仅 8 千美元离开戴克拉霍姆的家是不可想象的。“我没有接受。我不同意 8 千美元的价格，因为如果我搬走，我就会失去所有[和房子有关]的工作，就不会有收入。”对于那些像苏法尔一家一样，决定拒绝条件并留下的住户，公司的威胁转变为暴力行为。

苏法尔回忆说：“公司有时在夜里来拆房子，我们一起抗议，但公司的人带着工具，而我们只能互相拉着双手……公司和居民之间发生争吵，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直到有时[公司]与居民打斗。他们给居民戴上手铐，打破他们的头……他们用军靴踢人。我亲眼看到这些……我们争取让他们和平地解决问题；没必要对任何人动武。”

一些社区领袖在压力下屈服，将他们的土地卖给了公司；其余的居民则进行抗争，他们通过组织媒体会议和音乐活动来向公众显示，他们的社区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并决心捍卫保留自己土地或得到适当赔偿的权利。

苏法尔参加了社区在市政厅外定期举行的抗议。她解释说：“我们去[与市政厅的人]见面，要求解决问题。然后，我们去与公司见面。接下来，我们去首相的家，向保安递交文件。然后，我们等待消息。我们等了，但从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苏法尔耸了耸肩膀：“我们尽了最大努力。”

2008 年末，社区的抵抗行动终于开始显示成果，7NG 似乎愿意就房屋赔偿问题与社区谈判，但就在此时，开始有传言说整个村庄即将遭到大规模驱逐。居民每晚都在站岗，他们无法确定村庄是否会在天明前遭到包围和袭击。苏法尔解释说：“我们在夜里轮流站岗。[每次]3 个人……观察公司的行动。”

2009 年 1 月，公司向剩余的住户提出 2 万美元的搬迁费。几家住户立即接受了条件，拥有最大房子和土地的其余住户则拒绝，他们认为这些房子和土地的价值要高出数倍。一些住户提出了并非高出公司出价很多的价格，以争取达成更公平的协议，但毫无效果。

经过与家人商量后，苏法尔的母亲决定接受公司出价。在此一个月前，苏法尔生下了蒂达，并急于在一定程度上为家人创造稳定的未来。苏法尔说：“我准备以两万美元的价格卖掉。我以为我能用这笔钱买一座合适的房子，但房子需要在金边，这样能靠近我丈夫工作的地方，以及在我侄子和侄女的学校附近。”她的母亲前去与 7NG 的代表见面时，被要求在中国新年后再来。“但就在新年前不久，”苏法尔说：“他们驱逐了我们。”

催泪弹和橡皮子弹

2009 年 1 月 24 日周六凌晨两点，当局开始驱逐戴克拉霍姆约 400 家住户。警察封堵了村庄周围的街道。在 6 点天明时，数百名武装警察、宪兵和拆迁人员进入了村庄。推土机和挖掘机开了进来，并开始拆房。

受到惊吓的居民在村庄周围互相拉起双手，以显示最后的团结和抵抗。警察不顾记者和人权观察人士在场，向居民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拆迁队则用大锤和斧头拆毁房屋。一些人把自己锁在家中，但拆迁者破门而入并摧毁房屋，几乎不顾居民的安全。

“他们说，他们不会对任何受伤人士负责，而且我应该走开，所以我抱起孩子走了。”

苏法尔说：“我求他们不要拆毁我的房子，但他们不同意。他们说，他们不会对任何受伤人士负责，而且我应该走开，所以我抱起孩子走了。我去找我妈妈……但他们放了毒烟[催泪弹]。他们到处放……因为有烟，没有人能呼吸。我的一个姐姐有破伤风，当拖拉机拆房时她在楼上，她摔下来，被一枚钉子扎伤。”苏法尔回忆道，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苏法尔家的房子和所有财产都被“完全压碎”。她说：“我只能挽回出一台缝纫机。”

到中午时，戴克拉霍姆村不复存在。

公司的一辆卡车将震惊中的住户转移到约 20 公里外的达纳克追扬。苏法尔说：“他们问我们要不要上卡车，[但]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各住户在新定居点入口处尘土飞扬的路边下了车。苏法尔回忆说：“那是第一天，我来到达纳克追扬，我四处走了一下，感觉就像被人从我的村子强行驱逐出来，那里一直给我和家人带来欢乐……我感到非常无助。我很生气……”

我恨他们。”

“幸运抽奖”

被 7NG 认定为在戴克拉霍姆“拥有”房屋的家庭，通过“幸运抽奖”分到了新定居点的公寓房。而租户和市场摊贩则被丢在路边，只能依靠自己。近 1 年后，这些家庭被搬到坎达尔省（Kandal）一处位于金边西北面 40 公里外的偏远贫瘠地区，一些家庭现在处于赤贫状态。

苏法尔的母亲住到一所佛寺中，她仍未从驱逐行动导致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她的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有的去其他省份重谋生计，其他人则在金边附近租房。苏法尔和她的丈夫最终搬到了新定居点的公寓房中。

达纳克追扬实际上是金边附近较好的新定居点之一，被从城中驱逐的许多其他家庭，仅在偏远地区得到一块贫瘠的土地，没有任何建筑和设施。虽然相对来说占优，但苏法尔发现在那里几乎不可能生存。她说，起初“我不得不靠在稻田里找牵牛花和螃蟹……来生存度日。”他们没有钱来通电或付水费，所以“我每天点油灯……并从池塘里取水来做饭。”

虽然各住户得到 1 千美元的贷款，但苏法尔说：“对我们家来说，我们失去了工作。[所以]我不敢借钱……我们怕还不了钱……其他贫穷和生活悲惨的人接受了贷款。一些人用这笔钱来通电通水……等等。”

更糟糕的是，蒂达在驱逐行动后开始出现呼吸问题，当时她只有两个月大，她最终被确诊患有肺炎。苏法尔说：“我开始送我的女儿去接受治疗，因为她越来越瘦，只剩皮包骨。”

“没有人认为她会活下来……我从我丈夫家乡那里借钱，送我的女儿去医院，以治好我女儿的病。[她]大概 1 年后恢复了健康。但我失去了一切。”

罗斯·苏法尔 (Roth Sophal) 在 2011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与国际特赦组织谈话。

“我来到达纳克追扬，我四处走了一下，我感到非常无助。我很生气……我恨他们。”

洪

“白朗是原住民安身的地方，就像我们住的房子，一座充满自由的房子。如果白朗没了，我们就不可能生活。”

柬埔寨北部的白朗森林，可能是该国最大主要由残存原住民使用而连接成片的土地。白朗森林周围 339 个村庄中的约 20 万居民，依靠森林资源为生，其中许多人是库伊人原住民。一些公司近来获得了白朗大片地区的特许土地，用于工业化农产品种植和采矿。原住民传统上赖以生存的森林遭到摧毁，他们在使用祖传土地方面受到限制，而当局没有事先得到当地社区的同意，这违反了各种人权条约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这些公司的活动在威胁当地库伊人社区使用、管理和控制其传统土地和资源的能力。

38 岁的洪是一名活泼的库伊原住民妇女，她有 5 个孩子。她走过白朗森林中的树木和灌丛，有时停下来指出具有药效的植物。她解释说，在她成长期间，她的祖父教她如何识别具有疗效的特殊植物。“那些药有效，”她说。有的会“比医院的药治病更快。”

对于洪和生活在白朗周围的其他村民来说，森林是他们日常必需品的关键来源，包括食物、水和药材。许多居民是库伊人，这是柬埔寨大约 25 个已知的原住民群体中最大的一支。洪解释道：“对我来说，白朗是原住民安身的地方，就像我们住的房子，一座充满自由和便利的房子……充满财富的房子。”库伊人像他们祖先那样，认为自己是森林的看守者。他们的万物有灵信仰，在他们的环境及他们与森林的关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白朗在库伊语中的意思是“我们的森林”。

白朗森林横跨柬埔寨北部的 4 个省份。因为从未被政府承认为受保护的森林，白朗地区没有精确的边界。该地区在湄公河与上森河（Stung Sen）之间，大约包括 3,600 平方公里的森林，核心地区有超过 8 万公顷的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丰富，有一些珍稀和濒危的树木与动物种类。

自 1990 年代以来，该森林日益受到伐木公司的威胁，近来这片资源丰富的地区还因潜在矿藏而面临危险。越来越多的公司活动，以及他们对大片森林土地的控制，使库伊人难以按习俗来维护土地和森林。洪说：“我们的生计完全依靠白朗。如果白朗没了，我们就不可能生存。”

洪在白朗地区周围长大。她说，她的社区在森林中几乎能找到一切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一起到森林里去，[森林]没有边界，”她解释说。“如果我们想要一些蔬菜来做饭，我们就到森林里去……有时我们的狗捉野猪……来给家里人吃……[我们还能]去池塘捉些鱼。”

这些由泉水汇集的池塘，在白朗地区到处都能找到，是重要的水源。洪解释说，家务活动的燃料也来自森林。“在白朗，我住的地方……我只用树脂灯。我们去采树脂，并割下 preal 叶，把他们浸泡在树脂里，然后点燃照明……当我做饭时，我烧浸泡在树脂里的叶子，添加木柴来做米饭和吃的。”

采树脂不仅是村民的能源来源，而且是数万人重要的生计来源，有时还有利可图。通过受控制的燃烧来从树干上采脂，不会损害树木。洪的社区还采集藤、攀缘植物和其他非木材森林产品来出售。她说，只需花费少量的收入来买盐、香料和建房材料，大多数资源都可以在森林中找到，或可种在森林中肥沃的土地上。这些资源其后由社区分享，或被用来交换其他商品。“我们住在那片地区，遵循我们互相帮助的传统习俗。如果我们发现鱼或肉，我们就分

享。我们不用搞许多贸易。”

库伊人采用一种由他们的精神信仰主导的轮耕方式。洪解释说：“在 11 月，我们向[我们的灵魂]神灵 Banchoul Arak 祈祷，[这样]他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一年该去哪片森林。我们遵从他的话……来年我们再问同样的神灵，然后去另一片森林。3 到 4 年[后]……我们回到以前的森林。这是我们的传统。”

对于满足她的社区的生计、精神信仰和日常需要，森林起到核心作用。洪因此认为，为了她的子孙后代而保护森林是至关重要的。“我想为后代保留白朗……这样他们就有欢乐，就像我现在这样。”

公司的到来

柬埔寨势力强大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集团在开发白朗地区的资源。虽然日益受到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愤怒的谴责，他们继续否定该地区对约 20 万柬埔寨人的生计，以及库伊人的精神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另外，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白朗地区的生态和环境价值，包括其关键的分水岭功能，即在雨季防洪并在旱季放水。

2002 年，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政府停止了发放任何新的森林伐木许可。用于伐木的特许土地无法再可使用，虽然仍发生一些非法伐木的情况，但毁林的速度在一定时期中有所减缓。尽管如此，势力强大的伐木者不久就找到了其他方法，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对白朗地区大片土地的控制，是通过经济特许土地实现的，用于工业化农产品种植，例如橡胶，或开采铁、铜、黄金和开采其他矿产资源。观察人士说，这些土地特许权可能导致出现更具破坏性的土地使用新方式，从而威胁白朗地区。将森林转变为种植园的行动，往往包括砍伐珍贵的大树，然后用根本改变地貌的方式耕地，使森林不可能重新生长。

许多此类交易是秘密进行的，向私人利益集团赋予土地特许权的有关过程普遍缺乏透明性，这意味着无法获得或难以核实精确的信息。但外界知道，在 2010 年，当局至少批出了 27 项大白朗地区的经济特许土地权和开矿许可。在一些情况中，这些特许土地受到私人雇佣的军队或警察的保护，这些军警阻止当地民众进入特许土地，包括阻止他们接触其依赖的森林资源。

其中一项开矿许可是在 2007 年授予一家韩国公司 Kenertec Resources，该公司获得对洪所在的弗尼克洛鲁克村（Phneak Roluek）周围地区的勘探权，洪称其中包括库伊人的神圣土地。洪对采矿行动、该公司的情况和特许土地的边界所知甚少。她也不知道该公司未来的计划，以及该计划将如何影响她的村庄、社区民众进入森林的权利和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她说，他们没有和当地村民协商。“每次有公司来投资时，他们从没有来了解当地社区，了解村民或和他们讨论。他们只跟村[长]或乡[政府]级别谈话，然后了事。”

洪担心，矿业公司的出现，对她的社区继续用传统方式使用土地和森林的能力构成严重威胁。她说：一些公司“有军人日夜守卫… 如果社区的人进入矿业公司的土地，就会有问题；他们威胁我们。他们有武器……有人问，如果土地是属于社区，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说土地是公司的，因为政府已经把土地给他们了，已经盖了印章。”

她还担忧，她的社区和其他类似社区将来会被迫离开，原因不是被公司逼迫离开，就是他们无法再接触其赖以在该地区生存的资源。“[有时]我知道驱逐一定会发生的。”她说。“如果他们不断深入，就会发生驱逐，就像其他省份那样。”

洪是在 2002 年最初知道，她村庄附近的白朗地区正迅速遭到摧毁。“开始时我看到[一名公司代表]来和村长谈，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达成了协议。那时候村民不是很了解情况，”她解

解说。“他们[听说]在公司来了以后，他们可以当劳工……半年以后，他们看到公司砍了那么多的 chambak 和 chbah[树脂]树，而这些树都是属于村民的…[公司]还不许村民到森林里取得非木材产品。所以村民认识到，他们以后会失去生意、贸易、非木材产品，而且[他们怀疑]他们的森林怎么可能以那样的方式保护。”

“这是我的权利”

洪回忆柬埔寨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来教当地人取胜的策略，并鼓舞当地人。他们教村民如何进行积极的非暴力活动和倡导活动。”洪当时感到好奇。因为附近缺乏优质的教育设施，她在儿童时期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而且她的家人指望她照顾生病的母亲并帮助采集食物。

她回忆：“对我来说，在 2002 年我根本不知道社区是指什么。那时我觉得自己很蠢。”她说，当非政府组织来到时，“我马上受到鼓舞。”洪告诉非政府组织的培训者，一名军人不允许她卖树脂。“我说这是我的权利，我可以卖给任何我想卖的人。我无法相信我能说‘这是我的权利’，我以前从没有了解到任何有关权利的知识。”

洪为保护白朗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一张申诉书上按了手印，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她加入一群 240 人组成的社区活动人士，去金边向政府表达对公司伐木活动的担忧，并向国王递交请愿书。

自那以后，洪成为一名积极活动的社区领袖。她几乎没有时间去做家务，因为她忙于“从事保护白朗的工作……从一个村庄[去]到另一个村庄，”组织请愿和抗议，并参加社区的森林巡逻。她参与了几项有关人权、柬埔寨法律和倡导活动的培训计划，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课堂里受教育。如今，洪教授其他人知识。“我教了[社区]很多。有时我在宝塔里教，有时是在学校里，有时是我们妇女在家闲聊时。”

洪是一名未受过正式教育识字的库伊妇女，但这些机会改变了她的生活。“大多数库伊人不识字，”她解释说。“通常，在农村如果我们不识字，其他人就看不起我们。像我这样，没人看得起我…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原住民的孩子很困难：因为不识字。当我们去集市时，他们说‘库伊人很笨，他们连一封信都看不懂。’这真的让我很痛心，我的孩子不识字的时候，我非常担心。”

洪说：“[我们]需要受教育，这样别人就不会看不起我们，不会侵犯我们的权利，”她说。“我在一点一点地学习和工作。”她还认为对于保护白朗从长远来说，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我要我的孩子学习法律来保护森林……只要我们懂得法律，就没人能侵犯我们的权利。”

“一名妇女领袖”

作为一名妇女，洪还必须打破其社区有关妇女角色和能力的成见。她解释说：“在社会上，妇女仍然没有和男人平等的地位，因为一些妇女贬低了自己，她们认为自己不能和男人相比，但我认为我能。”她笑着说。

洪说在以前，“我觉得有些事我做不了……自从我开始……参加社区工作后，我决心尽力去学，因为我认为，懂些东西至少会使人不再看不起我……[现在]我作为村代表，已经为我的村子工作了两年。所以我认识到：‘哇，虽然我是女的，但我可以做一些工作。’现在我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我做出了成绩，我是一名妇女领袖。”

“我想保住森林，按传统方式来一步步地谋生。”

虽然洪有个人成就，并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水平，而且受影响的社区增强了组织能力，但白朗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村民生活或依赖的大片土地被赋予特许权给一些新的公司，用于种植目的。一家名为 CRCK 橡胶发展公司的越南公司，在 2010 年获得了 6 千公顷的土地。2011 年 2 月，大约 400 人试图在 CRCK 的办公室外，抗议该公司清除森林的行为，宪兵和省级警察将他们堵截，向空中开枪，并把枪口对准抗议者。

洪在一个月后参加了行动，村民当时要求 PNT 有限公司提供信息，村庄附近的另一块土地被赋予特许权给了该公司，用于种植橡胶。“社区去进行倡导，”洪解释说。“他们要求公司出示许可证，并问公司查询哪一个部门向公司颁发了开展业务的许可证。公司把村民赶走，并威胁他们，不让他们看到许可证。”

洪的村庄没有学校，没有医疗保健中心，也没有电和铺过的道路。但洪说：“对我们原住民来说，不管路有多差，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想自由地生活。如果路变得更好，我们会有[更严重的]失去土地问题，因为公司可以更容易地来到这片地区……我们也不愿看到公司过来。”

在洪看来，“发展只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金钱花费……而钱花玩的时候，村民却已经失去了土地和[自然]资源。我在其他村子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不想要那样的结果。我愿意把我的土地留给我的子孙或无家可归的人……我想保住森林，按传统方式来一步步地谋生。”

福克·洪 (Phouk Hong) 在 2011 年 5 月 26 日与国际特赦组织谈话。

“现在我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我做出了成绩，我是一名妇女领袖。”

希普

“当我有一两公斤大米时，我分一些给其他人吃。如果她们的孩子病了，我就帮忙送他们去医院。如果我们面临相同的情况，我们还会怎么做？我们一起面对困难。”

2009年3月22日，暹粒省齐克郎乡（Chi Krong）的175家住户被逐出耕地，而他们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就依靠这些耕地来获得食物和生计。齐克郎大约80名农民当时正在受争议的土地上试图收割稻谷，警察和宪兵在政府人员的陪同下包围了他们，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地区。当农民拒绝离开时，警察开枪射击，导致4名村民重伤。12名村民被捕，并在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判犯有各种罪行而受到监禁。虽然在2011年7月时，他们都已获释，但当局仍禁止齐克郎这些家庭回到他们的耕地。

2009年3月，齐克郎的收割季节刚刚开始。希普的丈夫萨温（Savoeun）和许多其他村民一样，前去他们的稻田进行收割。在他离家去开始收割稻谷时，希普对他说再见。她当时并不知道，几个小时后的他和其他大约80名农民会受到警察的威胁和射击，而且萨温会被逮捕。

实际上那将是农民最后一次去稻田里收割，因为保安部队在当天稍后时间切断了他们去稻田的道路。那天早上标志着175家齐克郎住户和关系强大的商人之间的土地纠纷，达到了暴力冲突的顶点，这些商人称他们从别人那里购买了这些土地。

当时25岁的希普正在做日常家务，逃离暴力事件现场的村民惊恐地冲入她的房子，喊道她的丈夫被捕并被关押在区政府的办公室里。希普急忙去见萨温，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当他到稻田里和其他农民一起收割时，他们被大约100名警察和宪兵包围，暹粒的检察官、副省长和区长带领这些军警，要求他们离开该地区。当萨温和其他村民拒绝离开时，警察开枪射击。

4名农民被击中，他们的大腿受了重伤。许多其他村民遭到严重殴打，然后被捆绑起来，数小时中无法得到医疗，另有43名村民被拘留，其中大多数人在签署了一份放弃土地权利的文件后获释；但萨温拒绝签名放弃他的权利，当局认为他是滋事头目。萨温等9名村民被控犯有各种罪行，包括偷盗稻谷，他被带到离家100公里外的暹粒监狱。在后来的几个月中，齐克郎的其他3名村民也因和土地纠纷有关而被逮捕和拘留。

在一瞬间，希普的丈夫和家里的耕地都被夺去，她不得不独力照顾自己的4个孩子，勉强度日。

希普和丈夫以前辛勤劳动，在普泥村（Pnit）过上不错的生活。他们有简陋但宽敞的住房，但没有厕所和足够的供水。他们有充足的稻田和耕地。几乎85%的柬埔寨人依靠农业为生，大多数家庭靠至少1公顷的土地来种植稻谷或其他作物。

在稻谷播种和收割季节之间，萨温是一名建筑工人和摩托出租车司机，希普则在空余时间制作柬埔寨式样围巾和其他物品，来增加收入。她和萨温能避免债务，而许多其他家庭则被迫借钱来购买种子和肥料。这些家庭如果遭遇歉收，就几乎肯定要卖掉土地来还债。这是农民失地的常见原因之一。

“我不得不付出双倍或三倍的劳动来养孩子，送他们去学校，我们没有多少米可以吃，[也]没多少水可以喝。”

希普和萨温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知道他们自己因为缺乏教育而处于劣势，所以他们很看重学校教育。“我的孩子喜欢上学，”希普解释说，“因为我的丈夫总对他们说：‘好孩子，争取努力学习。我不识字，所以我生活困难。’”

希普对于她和丈夫过的生活感到自豪和满意，然后在 2005 年土地纠纷开始发生。

土地纠纷

开始时，包括希普家在内的齐克郎乡住户，声称自从 1980 年代末期开始就耕作了一片 475 公顷的肥沃土地，而邻近安龙达诺乡（Anlong Damnor）的 44 家住户也称拥有这些土地，他们之间发生纠纷。当齐克郎的住户试图修理该土地上的灌溉系统时，安龙达诺的住户制止了他们，并要求省政府干预。一年后，安龙达诺的住户已经将部分土地出售给商人，这些商人又将土地卖给该地区之外的其他人。齐克郎的住户现在发现他们是与关系强大的人发生纠纷，这些人得到掌握着权力的区和省政府的支持。

局势变得紧张。在 2008 年下半年，齐克郎 3 名村民被捕，并被指控犯有人身袭击和煽动的罪行，希普称他们当时是“带领村民要求归还土地”。逮捕那些挑战强行驱逐的社区领袖，已成为势力强大并与当局勾结的商人镇压和恐吓的工具，这种情况日益常见。为抗议这些指控，约 200 名村民在暹粒法院前焚烧了轮胎，并要求释放这些人，被捕者随后很快得到保释。

尽管当局采用恐吓手段，齐克郎社区拒绝屈服。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集团试图窃取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因而不愿投降。2009 年 3 月 22 日早上，当村民去收割稻谷时，他们的决心坚定。一些人向压力屈服来避免被捕，这可以理解，但萨温即使在被拘并在不公审判中被定罪后，仍公开挑战不公。尽管如此，由于希普勉强度日，他对她承受的负担深感忧虑。

“一只没有窝的鸟”

希普不得不独力照顾孩子，她说她感到迷失。丈夫不在家中，父母也已双亡（她的母亲在萨温被捕几个月后去世），她说自己像“一直没有窝的鸟”。

“现在，”希普悲叹道，“我不得不付出双倍或三倍的劳动来养孩子，送他们去学校，我们没有多少米可以吃，[也]没多少水可以喝。”希普和村里其他失去土地的人，不得不找体力劳动工作，为其他人播种和收割稻谷。他们的工钱是大米或现金，但艰苦的体力劳动得不到很多回报。

希普称她面对“艰难”的新情况，并承认“作为一个面临很多问题的妇女，[例如]一个人生活，不得不挣钱养孩子，有时[她]想逃走。”她说：“我告诉自己，不要对没有丈夫这件事想太多，不然我会发疯……[我]只想我明天会做什么来挣钱……会为孩子找到什么吃的东西。”

“许多男人看不起我，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她吐露。“他们对我说：‘你不想找一个新丈夫吗？如果不想找，你丈夫在监狱里时谁会来帮你？’希普的孩子也因为父亲入狱而处境困难。希普称他们从学校回家后抱怨说，学生和教师取笑他们，“这些人说：‘如果你爸爸是犯人，一个偷土地的贼，还怎么可能把你教好？’……[所以]他们不想去上学。他们觉得可

耻……但当他们去[监狱]看望爸爸时，他告诉他们要争取努力学习。”

互相帮助

虽然自己面临严重问题，希普仍尽力帮助村里的其他妇女。“当我有一两公斤大米时，我分一些给其他人吃。如果她们的孩子病了，因为我有辆摩托车，我就帮忙送他们去医院。如果我们面临相同的情况，我们还会怎么做？我们一起面对困难。我们互相关爱，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遭遇，同样的问题……有些丈夫被抓的人怀孕并有小孩，所以我争取帮忙……她们不得不自己养孩子，就像我一样。她们和我一样孤单……我一想到这事就哭。”

“我觉得更坚强了，因为我失去了我依靠的人，所以我必须帮助自己，”希普反思说。其他妇女“鼓励我，帮我出主意该怎么做……以前我是名家庭主妇，现在我什么都可以做。男人能做的，我也能做，来给我的孩子挣钱。”她说在她的村庄，女人被认为在体力和智力上都不如男人。

“我认为不对，”希普说，“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有主意和见解。[实际上]女人不得不比男人干更多的活。男人只是出去挣钱，[而]女人必须在家做许多事，比如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取水、生火、磨米。我听男人说女人就是在家照顾娃娃，但连让娃娃不哭都做不到……我觉得很生气。如果男人能喂自己的奶，我就会让他们喂，[我就会]出去挣钱，”她笑着说。“那样更容易。[如果我们男人]，我们回来后饭已经准备好，我们洗澡然后睡觉。”

“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村长是女的。反对党森朗西党（SRP）的一个代表是女的……穆苏察（Mu Sochua）[议员]……我想和她们一样，”希普沉思道，“但我不能实现，这只是幻想，因为我现在年纪很大了，我觉得不能学习。我总是问尊者[僧人]我能不能去学习，他问：‘你能和孩子坐在一起吗？’我说：‘只要我能[学习]我不在乎羞耻！’”

在面对困难的情况下，她新开始的自立生活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希普去监狱探望丈夫需要 10 万瑞尔（25 美元）的路费，只要她能筹到钱，她就尽量经常去探监，为他买食物、药品、肥皂和其他必需品，她还买票去拥挤的探监区，隔着铁栏杆和丈夫交谈。

暹粒监狱最多可容纳 1,000 名犯人，但目前却关押着 1,500 多人，狱中条件十分恶劣。希普说，萨温每天只能吃两顿小碗米饭。但她不能确定，萨温是否得到了她送去的食物和其他物品，这些都交给了看守，她说其中一部分被看守据为己用。

希普不确切知道萨温会被关押多久，因为他被控犯有数种罪行，包括人身袭击和偷窃稻谷，而每项罪名都分开受到审判。她对法院缓慢、低效和不公的程序深感沮丧。她讲述说，在开庭当日，“当齐克郎社区的人来鼓励被告时”，审判却推迟进行……在其他时候，审判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及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希普抱怨司法不公。“柬埔寨的法院系统总是有偏向……白的变成黑的，对的变成错的，”她说。“对于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做的总是对的。政府不帮人民致富，政府只帮富人压迫穷人。”

“腐败的人仍然腐败。政府官员仍然在利用关系。穷人怎么能够有机会受教育？”

希普说她想看到柬埔寨发展，但对她来说，发展意味着公正、权利平等以及穷人有适当的代表：“我说的‘发展’是指犯罪的人会被判有罪，像在齐克郎开枪的人，无辜的人会被释放……[现在]司法系统里的人是那些有钱来买官的，所以穷人怎么会有机会？”她问道。“政府为什么不顾人民？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在电视上，他们总是在说他们帮助穷人？帮助穷人？怎么在帮？腐败的人仍然腐败。政府官员仍然在利用关系。穷人怎么能够有机会受教育？”

希普希望，她的国家有朝一日会有真正的民主，贫困者会被作为具有平等权利的平等公民来对待。“我想让政府亲眼看到穷人，并关心穷人……而不是只顾他们的权力和金钱，”她说。“穷人也有感情和权利。”

后记：萨温获释

2011年4月，萨温在被捕两年后获释。据希普说，萨温被迫签名保证，不对他们的稻田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也不试图进入该土地。如果他违反保证，就会被捕。希普和萨温后来分开了，她去泰国生活。

覃·希普在2011年3月13日与国际特赦组织谈话。

“对于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做的总是对的。政府不帮人民致富，政府只帮富人压迫穷人。”

万妮

“最后，无论输赢，我都仍然感到快乐，因为我和其他人一起抵抗了。我会为住在我的老宅而斗争，抗争到最后一轮。”

2007年，一家公司得到了金边市中心万古湖地区99年的土地租约。1年后，该地区约两万名居民受到驱逐威胁。搬家条件只能是接受8,500美元或金边市郊新定居点的一套公寓房，对于大多数住户来说，这不足以让他们找到适当的替代住房或工作。许多接受条件的家庭遭遇了严重困难。居民没有得到有关开发计划的适当通知，也没有就确认驱逐行动的替代方案或新定居点和赔偿条件而协商。到目前为止，居民试图通过法院来得到补救的努力均告失败。那些继续抵抗强行驱逐的住户提议，当局应允许他们留在自己的房屋或开发地区内所建的替代住房中。2011年8月，首相授权将万古湖地区的一部分土地用于为存留居民原地建房。

万妮家的墙上有一幅她20岁出头时的照片。现年31岁的万妮看着照片苦笑。“我那时美丽丰满，”她沉思道。“现在因为驱逐带来的精神压力，我觉得老了累了。”

自2007年起，万妮和她的家庭就在强行驱逐的持续威胁下生活。在那一年，柬埔寨政府将金边市中心133公顷的黄金地段租让给了一家私营公司。

租让的土地包括一个90公顷的湖泊，当时有4千多家贫困和中产阶级住户生活在那里，包括万妮家。根据柬埔寨法律，租让土地上的许多住户有很充足的法律理由来声称拥有土地，但政府在将土地出让给Shukaku股份有限公司时对此置之不理。

万妮和丈夫齐（Chea）在22号村的土地，是从她公婆那里得到的结婚礼物，而公婆是在1993年购买这块土地。万妮和齐拆除了残破的房屋，并用积蓄建造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家，还建起一个小店铺，万妮在那里做出售日用品和化妆品的生意。

万妮能照料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并经营商店，来补充丈夫作为军人得到的微薄收入。他们享有城市中的服务和设施：可负担的水和电，离家步行距离内的一所好学校，以及医院。万妮不想搬走。她说：“我们在这里能有很好的未来。”

万妮出生并成长在柬埔寨南部贡布省（Kampot）的农村。“我从小就没想象过我会有这样一座房子，”她说。她的父母很贫穷，当她还是孩子时，万妮就靠捡破烂来增加家庭收入。她在9年级时辍学，帮助家里人生活下去。但万妮认定学习英语很重要，所以她找到一名允许她加入班级的教师，但她经常无法支付每小时100瑞尔（0.02美元）的学费。几年后，万妮为寻找工作和机会而搬到金边，她不久就在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前台接待和收银员的工作。

通过努力工作、决心和公婆的帮助，万妮有所成就，她对此感到自豪。但万古湖的土地租让和强行驱逐的威胁，彻底打乱了她作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和小生意业主的快乐生活。“开发商在2008年来了，”她解释说。“政府……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已经把万古湖地区交给Shukaku开发，当公司在这里设立办公室时我们发现。”

赔偿不足

不管土地的面积和房屋及其他结构的质量，金边市政府对住户提出的搬迁条件是 8,500 美元的赔偿；或搬迁到金边 20 公里外的达纳追扬地区。万妮说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赔偿，但住户在压力下接受了条件。

她问道：“如果政府告诉他们，假使他们不接受，他们的房子就会着火或发大水，他们就连 1 瑞尔都拿不到，他们怎么能说不？”她说武装警察和公司人员在村庄周围走动，或驾驶摩托车，以恐吓和威胁居民。

那些接受赔偿的人只能在金边市郊买房，远离他们的工作地点和基本的服务。万妮解释说：“一些人在找到要买的地方前就把钱用完了，他们又回万古湖地区租房住。其他人找到 4,000 到 5,000 美元价格的地方，但那里也面临驱逐，他们又被驱逐了！”

居民得到的另一项选择是搬到达纳克追扬的一个新定居点。万妮担心，无论哪种选择，她都不得不搬出市中心。她想知道他们将如何在那里谋生，或如何能负担每天去城市工作的路费。已经搬家的邻居告诉她，生活变得艰难得多。“如果我们不得不搬到远的地方，什么都会变得困难，”万妮说。“我们家越来越不快乐。”

2008 年 8 月，Shukaku 公司开始填湖，将其开发成房地产黄金地段，而湖周围的住户则开始面临威胁和恐吓。官方称，开发计划是将该地区改造成商业、文化和旅游中心。但许多人认为，开发商只会将该地区分割后出售来谋取暴利。

现在当万妮走在她家外面的街道上时，她看到湖几乎已被沙子填满，填湖工程是在两年半以前开始的。万古湖是一处重要的蓄水区，将其变为陆地的行动已在雨季导致周边的社区发生水灾。

在以前湖边的村庄，排污和卫生系统出现堵塞，引起健康危险。在雨季期间，居民必须趟过脏水，有时上涨的水位超过了房屋的地板，造成住户没有干的地方睡觉。填沙机则直接对着住房，使房屋充满泥浆，住户只能离家。

万妮家前面和旁边街区中的一些剩余房屋，是现在仅存的邻居。村庄中大约半数住户已因压力和无法维持的生活条件而搬走。现在村中一片死寂，万妮不得不关闭她曾经生意兴隆的店铺，每天的生活因此更为艰难。

社区的抵抗

2008 年 9 月，居民开始出现对强行驱逐的有组织抵抗。在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一名柬埔寨律师的协助下，万古湖地区的代表向金边市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在确定土地租约的合法性前制止填湖行动。法官驳回了申请，裁定法院没有权力受理该案件，称该案是就没有产权的土地发生的纠纷，属于地籍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居民就裁决提出上诉，可惜失败了。他们称地籍委员会的权力仅是仲裁就未经登记的土地发生的纠纷。他们坚持说，法院确实有权受理他们的申请，并可以就租约的合法性和相关的违反《土地法》行为进行调查。另一项旨在撤销租约的诉讼被法院职员阻挠，职员认为根据《民法》，提出申诉的法院费用就超出 4 万美元。

与此类似，居民对地籍委员会、金边市政府、国民议会和内阁提出的申诉也遭拒绝，或干脆被置之不理。万妮说：“系统是有的，但当[居民]送文件过去或提交建议和要求，[政府]就默不作声……所以居民认为，在柬埔寨可能没有人为人民和国家工作。”

“我继续动员社区，来坚定[居民的]意志，这样社区能保持坚强和独立，并能说服政府改变想法。”

2009年，万妮决定加入抵抗征地的行列。她如今是最敢于直言的社区代表之一，动员湖周围所有村庄的剩余居民，去参加市政厅和公司办公室外的抗议。万妮解释说，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她了解到她的权利和法律，而这使她和她的社区“更为勇敢”。她说：“我继续动员社区，来坚定[居民的]意志，这样社区能保持坚强和独立，并能说服政府改变想法并尊重他们为无辜者服务的义务，这些无辜者是真正的受害者，比如万古湖的居民。”

妇女站在前线

湖周围的居民依靠万妮来提供建议和支持。她家的前院成为临时的倡导活动办公室，领导抵抗活动的妇女群体定期在万妮家会面，讨论最新的地方当局恐吓事例以及她们保持抗争的策略。

万妮对那些“同甘共苦患难”的妇女感到骄傲，她认为妇女能“比男人更出色”地进行倡导工作。尽管柬埔寨宪法规定男女待遇平等，但她注意到妇女实际上没有得到平等待遇，而且“没有被重视”。“有时妇女去学校上学，但结婚后她们仍待在厨房里，或者在家经营很小的生意。他们认为妇女不能做任何重要的工作……[但]对于我们万古湖地区的妇女来说，自从 Shukaku 公司来到这里后，妇女争取推翻那样的看法……男人照常工作，妇女去抵抗。”

万妮解释说，妇女冲锋在前抵抗的一个原因，是担心如果男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就会失去工作。“在柬埔寨，如果我们让男人去参与倡导活动，而他有这样的职业，他就会在工作的地方受到很大压力，或者被降职。”妇女试图避免暴力，她说，但“即便我们是女的，警察……仍殴打我们。”

万妮讲述了一场遭遇，公司当时派遣约 100 名武装人员来拆除某人的房屋。那名男子没有同意接受赔偿并搬走，“但他们派那些人[去他家]……他们对居民非常凶狠，非常不公平。他们用权力和武器来恐吓居民，[但]我们一起抵抗。男人也参加了，但妇女一直在前面，因为我们害怕如果男人站在前面，一旦出事，[他们]就会打起来，所以妇女站在前面。”

万妮的抗争活动成为了一项全职工作。“公司从来都不休息，”她说，“所以我们需要警惕。”万妮斗志高昂，但承认难以同时承担家务。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公婆那里去住，并把他们转到附近的一所学校，因为她忙得无法适当地照料他们。“我对我和孩子们之间的亲情有些担心，”她不安地说。“[我]怕我们会因为万古湖的开发项目而互相疏远。”

对于妻子忙于倡导活动，而不是做饭和料理家务，一些丈夫可能会感到恼火。但与这些人不同，万妮的丈夫和孩子支持她的工作。她的孩子告诉她：“妈妈，你出去时要小心，要照顾好你自己。”

他们有理由担忧。2011年4月和7月，万妮和万古湖地区的其他妇女一起，两次因和平抗议而被捕，并遭整夜拘留。她们后来都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获释。这些逮捕没有能阻挠万妮，但在一个民主空间日益缩小的国家中，作为一名维权者，她确实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当我离开家时，”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指望回家。”

双赢局面

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及与世界银行和柬埔寨的双边援助方的会谈中，万妮和其他社区领袖表达了社区的观点和要求。在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社区制定了一项为愿意留在该地区的居民提供可负担住房的计划。他们提议，应划出一小部分租让给Shukaku公司的地区，用于给居民建造住房，而不应驱逐他们。万妮强烈支持社区的计划，她认为，虽然这意味着需要搬到比自己家小很多的房屋中，但这是双赢解决方案。

“当我离开家时，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指望回家。”

原地建房实际上是金边市政府供居民选择的第三项方案，但没有人认为这是真实的。因为当局告知他们，在修建他们的住房时，他们需要先搬到远离金边市中心的一处荒凉的新定居点生活5年。

2011年8月11日，首相下令将万古湖地区12.44公顷土地提供给剩余的800家住户，用于原地建房。

“许多人认为，这是居民示威的第一个胜利，也为柬埔寨全国的其他社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榜样。”万妮说。“当我们决定为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抗争时，我们不认为这是儿戏。我们很努力，因为如果我们输了，就会严重影响其他社区的斗志。相反，如果我们赢了，就会给其他社区带来许多动力和鼓舞。”

虽然这是社区的重大胜利，但该计划不会使所有的人都受益。计划细节尚未制定，而且一些住户没有包括在内。万妮说：“我仍担忧如何保护那片土地和我们的居民，确保每一个和大家一起进行抗争的人，都能从12.44公顷的土地中受益。”

自从参加抗争，万妮学到许多有关社会和自己权利的知识，并得到一种社区归属感和团结感：“我在倡导活动中与其他人分担责任。我们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为了相同的目的，为我们的家，一起合作……最后，无论输赢，我都仍然会感到快乐，因为我和其他人一起抵抗了。”

万妮坚持说她不会屈服：“我会为住在我的老宅而斗争，抗争到最后一轮。”

泰普·万妮 (Tep Vanny) 在 2011 年 2 月 16 至 17 日和 2011 年 9 月 6 日与国际特赦组织的谈话。

“我仍担忧如何保护那片土地和我们的居民，确保每一个和大家一起抗争的人都能受益。”

后记

柬埔寨各地有数万名与文中妇女处境类似的人。仅在金边地区，据估计在 1990 至 2011 年期间，该市 10% 的人口遭到了驱逐。开发计划和土地纠纷经常是驱逐行动的前奏，受影响社区的福祉最终被置于大商业利益要求之下。

原住民

《土地法》规定国家有权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授予原住民社区。集体所有权包含一切权利，并保护私有产权。根据法律，在正式登记原住民社区的土地之前，作为一项临时性的保护措施，社区有权根据传统来管理自己的土地，但当局一直无视这些法律条款。

根据柬埔寨已批准的各项国际人权条约，柬埔寨原住民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也保护这些权利，柬埔寨和 143 个国家一起在 2007 年签署了该宣言。该宣言强调了原住民拥有其传统土地的权利，以及赞同或拒绝开发这些土地的权利。

保护妇女的权利

本报告中的妇女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由于国家未能设立一个能尊重和保护她们权利的国家组织和基础结构。除了柬埔寨当局未能尊重和保护妇女的适当住房权之外，她们的证词还显示，警察、司法当局和政府行政部门也未能尊重她们的身心权利。在强行驱逐的背景下，妇女和她们的家人遭到了袭击、逮捕和拘留，并受到不公审判。

柬埔寨在 1992 年批准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该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保障妇女的人权，包括住房权，这使柬埔寨政府有义务尊重住房权，并提供有效的协商程序，而且尊重妇女在遭侵权时得到救济的权利。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柬埔寨还必须“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这包括积极挑战那些强化性别成见和性别不平等的习俗做法。

柬埔寨人民丧失家园和森林被毁的情况蔓延成灾，妇女处于抵抗的前列。如果抗争失败，她们还会处于严峻的困境。这些妇女的经历尤其显示，她们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条件、生计和身心健康遭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还显示这些妇女在试图通过国家行政和司法机构来讨回公道时面临的巨大障碍，这些机构应该但极少维护她们根据法律享有的权力。与此相反，法律和法院经常被用作镇压工具，压制那些敢于捍卫自己权利的人的声音。

最后的话

“首相[洪森]，各级政府机构……没有任何例外，所有的组织，[应该]知道[发生的事]并帮助我……这样我能和孩子和孙子团聚，我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想要回我的土地和房子。”

麦在 2011 年 3 月说

“有人在威胁，并在没有[给]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实施]驱逐。我要求[政府]为所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为没有得到赔偿就被驱逐的人作出干预。一些抵抗的人被指控，一些人为了不被逮捕，需要从家乡逃走。所以我要求政府帮助这些人，非暴力地解决[问题]。不要让[犯罪者]再虐待人们。”

苏法尔在 2011 年 5 月说

“我代表山区和森林地区的原住民，想向国内外的人、组织和捐助方传达一个信息……对于任何项目，我想让社区也参加，知道并承认项目。这只是一个为了尊重平等权利的建议。”

洪在 2011 年 5 月说

“如果政府是好政府，廉洁的政府，就更应该帮助穷人。不是穷人不懂得做生意，他们懂。但[我]想让政府亲眼看到穷人，并更关心穷人。他们不应该只顾他们的权力和金钱，并剥削穷人。穷人也有感情和权利。”

希蒲在 2011 年 3 月说

“我们确实希望[捐助方]会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来自民主国家，他们会尊重人权。他们不会想要他们的资金使人们受苦，所以我肯定他们会帮助柬埔寨人民，并推动政府来解决问题。”

万妮在 2011 年 2 月说